

文章

韩愈柳宗元

研究

蒋凡 著

并峙壮乾坤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K825.6

J57c

文章并峙

蒋凡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韩愈柳宗元
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蒋凡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
ISBN 7-5320-7217-7

I.文... II.蒋... III.①韩愈(768~824)-人物研究②柳宗元(773~819)-人物研究③古文运动-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8081 号

文章并峙壮乾坤

——韩愈柳宗元研究

蒋 凡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56,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 本

ISBN 7-5320-7217-7/G·7373 定价:(软精)16.70 元

韩愈柳宗元的生活、思想

及学风异同之比较

文坛中有“韩柳”犹诗家中有“李杜”，他们并驾齐驱，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在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柳这对好朋友成为文坛领袖。二人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又南北呼应，在风云变幻的生活实践和文学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深厚友谊。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骑鹤仙逝，临终托孤韩愈。如刘禹锡《重祭柳员外文》所说：“幼稚甫上，故人抚之，敦诗（崔群）退之（韩愈），各展其分。”韩愈的确尽心尽力地完成了对亡友的道义和责任。在不长的时间内，他连续为柳宗元写了三篇传诵千古的纪念文字：《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悲悼亡友，述其贡献，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其祭文就追叙了柳临终托孤之事，云：“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终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按：指长子周六）。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坠！”在古人看来，托孤之事何等重大！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不管遇到了什么风浪，韩柳之间或有争论纠葛，总的说来，不失为生死不渝的知交挚友，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至于在文学领域，二人交相辉映，恰如双峰插云，共同登上古代散文艺术大师的宝座，掀起唐代古文运动的高潮。但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常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看到韩柳常有矛盾和论争，却不去深入探究其本质，故史上不乏“扬韩抑柳”或“抑韩扬柳”之言，此轩彼轻，弄得韩柳优劣论纷纷扬扬，甚而流传了千余年。其实，依我之见，韩柳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断断于韩柳优劣的大比拼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韩柳在生活、思想、学术及文风上，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呈现了较为复杂的现象。可说是各擅胜场，互补则

双美，相替则两伤。韩柳各有其永不泯灭的光辉成就，殊途同归，一道登上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峰巅。

一、生活道路及思想品格之异同

韩愈(公元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公元792)进士。柳宗元(公元773—819)，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由于家庭及生活道路的异同，二人思想性格也颇有异同。

从生活经历相似的方面来看，首先是二人的家庭均非豪富，而是中小地主的小官僚出身，父辈官阶均不高，但声名甚佳。韩父仲卿，曾做过县尉、县令之类地方官，晚年调入京师任秘书郎，官卑职微。柳家虽出名门，但家道早已衰落，柳父镇也曾历任地方官，后入京师，做过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之类清望官。韩仲卿曾任武昌县令，政绩斐然，离任时李白为作《去思颂碑》，称颂他的施政是雷厉风行，“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一方面抑制豪强、保护百姓，一方面重视发展生产，表现了正直的政治品格。柳镇正直清廉的官声甚佳，他在地方敢于忤触节镇上司，在朝廷又力抗奸相裴参而名振天下，德宗皇帝称誉他是一个不会为儿子科举而去请托走后门的清官，朝廷制书称颂他是“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廉吏。父辈共同的清廉正直家风形成了家庭传统，给予后代良好的影响。后来韩愈之鲠直、疾恶如仇，以及柳宗元的端方、绝不同流合污，均是倔强而不甘失败的个性，即与父辈的良好家风影响有关。

其次，韩柳二人少年时，两家同样经过了战乱。韩家避乱江南宣城，柳家远祸江南吴中。韩愈十二岁随大哥韶州刺史韩会远赴广东韶关生活，而柳宗元十岁开外随侍父亲远赴湖北江西生活，走南闯北，经历风浪，两人增长了生活阅历，对日后的读书和创作产生了潜在的良好影响，不是单纯关在书斋中的文人。第三，韩柳儿童时期都具有聪颖的天资，更因长者督促，勤奋刻苦地攻读，为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抚养韩愈的嫂嫂郑夫人督教甚严，韩后来在《祭郑夫人文》中说：“此韩氏之门，视余犹子，诲化淳淳。”南迁宣城时，遵嫂之教，“始专专于

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兮，超孤举而寻幽。”宗元四岁时则受慈母之教而诵古赋十四首。学而能思，是韩柳二少年的共同特点。第四，一旦踏上仕途，起始的青年时期，柳氏一帆风顺，韩愈却起步维艰；但步入中年以后，子厚长贬不起，退之却屡蹶屡起。韩柳如出一辙之处在于：都经历了宦海风浪的人生考验，都具有丰富的贬谪生活之深切体会与具体感受，都同样熟悉地方和了解民间社会情况。后来，两人均发挥了屈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或“发愤抒情”的精神，当与其重压之下相似的贬谪生活有关。韩柳一齐倡导古文运动，当与其相似的生活道路多少有关。

而从相异的方面看，又是另一副面貌。由于家族门第及具体的经历差异，韩柳二人的性格颇有不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第观念虽在唐代受到一定冲击，但上流贵族社会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这只要考察一下唐代皇族及士人联姻的状况自可明白。是的，韩柳同样反对世家望族的妄自尊大的复古情结，主张任人唯贤、不择出身。如韩《行难》之文，以历史上“管敬子（按：即管仲）取盗二人为大夫于公，赵文子举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为例，反对世族垄断仕途，他甚至认为圣人贤人可能出于“胥商之族”，要知道，古时士农工商四民，胥商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很难一窥世家望族之门墙，于此可见韩愈反门阀世族的思想之强烈。这是从理论上为出身庶族寒门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参预政权开拓门径。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更是反对世族门阀意识的名篇。文中有云：“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德与位，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僂，斯可以甚惧。”作者针对古代世卿世禄的门阀制度，尖锐揭露了中唐时代世族豪门依仗世袭特权把持政权的腐败无能，强烈要求任人唯贤、不论出身。对于治国人才，作者否定了名存实亡的伪劣“名牌”，希望循名责实以举贤授能。在文章中，他实际上表达了中小地主阶级要求革新政治的强烈愿望。

但我们若进一步深入韩柳潜意识领域，则传统之影响仍清晰可辨。韩愈自称郡望昌黎，但谱牒难考，查无实据。他实际出身早已衰落的庶族寒门之中小地主，所谓北魏安定桓王之后不过是自高门族的标榜而已。他从小失去父母，寄养于长兄韩会家中，不管嫂嫂郑夫人待他如何恩爱，总难免寄人篱下的感觉。因此，他从小发愤，希望一朝出人头地，改换门庭，从而跻身上流社会，以此功名心切合乎情理。在中唐那家族门第仍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环境里，尽管他自以为满腹诗书文章，“谓青紫其可拾”（《复志赋》），以为获取功名只是寻常之事，但现实却相当严酷，四试于礼部（按：指科举中的进士科试）乃一得，三献于吏部卒无成（按：指博学宏词科试落选），缺乏强有力的后台可能是其原因，并非文章诗赋不美。虽然他在贞元八年登进士举，但淹蹇京师长安数年，一直无法释褐入仕，过着类似乞怜的辛酸生活，这怎么能不让人悲愤满腔呢？后来，他只能退求其次，通过地方节镇的推荐而登上仕途。年轻的韩愈急于改变现状，而现实却是举步维艰，在生活环境的压力下，他的性格日趋直率而躁急，甚至时有激愤和偏狭。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可说是三教九流人物众多，只要对其生活前途有点帮助，都曾“公关”相识，其交友表面似滥，实际却有自己的道义原则。这可读其《与崔群书》自可明白。他做官是再三贬谪，但终崛起而挺立当朝，其汲汲于功名也是从不掩饰的。他有三篇《上宰相书》，为求官而唇干舌燥，以致招世“急功近利”、“摇尾乞怜”之讥。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引张子韶言云：“退之平生木强人，而为饥寒所迫，累数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何哉？”其实，这是苛责古人。啼饥号寒、汲汲功名原非高尚，但作为一个封建士夫，如不登仕途，则犹如今日失业，不仅难以施展抱负，还有举家食秋风之虞。关键并不在于要官做，而在于做怎样的官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得官。唐时宰相操用人之柄。韩愈向宰相求官并没有请托后门，更没有通过贿赂等腐败手段来达到目的，有什么可怪可耻呢？唐时士子干谒名流重臣以求赏识推荐，犹如今之宣传广告，乃正常的登仕之途。韩愈上宰相书是时势使然，只是年轻缺少经验，不看具体形势，略嫌操之过急耳。这是方法方式上的

瑕疵之病，何必为此大惊小怪呢？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汲汲功名既有啼饥号寒急于要官的燥急一面，但又有其不遮不掩性格率真的另一面，包括自己的缺陷，也赤裸裸地加以暴露。虽然这样的形象并非光采，但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而肚里男盗女娼的虚伪官僚相比较，不是有性质的不同吗？具体事情应该具体分析，而不能只看其表面。

柳宗元则情况有所不同，啼饥号寒而汲汲功名之类的事绝对不会出现在他身上。他虽然和韩愈一样出身于家道衰落的中小地主家庭，但若论其家族渊源，则是另一番况味。柳家出身于河东柳氏家族，柳镇与宗元所出谱牒记载明白。河东柳氏在南北朝时就是北方的士族强宗，历朝封侯拜相者屡见不鲜。直到唐初高宗、武则天年代，河东柳氏与唐皇室及贵要联姻者不在少数，柳氏族人颇多占据朝廷要津之位，据宗元《送澥序》云：“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其高伯祖柳奭于高宗永徽初出任宰相，后遭武则天而贬死。此后，虽然柳氏势衰，但却无改其世族的传统面貌。柳镇就继承了河东柳氏家族的正直品格，柳宗元为此感到骄傲。其《伯祖赵郡李夫人墓志铭》云：“中书令讳奭，自中书以上，为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胄硕大而济其德厚，夫人以族属清显（按：赵郡赞皇李家，当时世家望族）而修其礼范。合二姓以承先祖，为士者荣之。”因此，虽然同为中小地主出身，但因家族渊源关系，他不同于韩愈，常常洁身自好，高自风标，不交非类，如其所言：“余慎取友，于心之虔。”（《祭吕敬叔文》）其所与交多士林精英，如刘禹锡、吕温、凌准、韩晔、韩泰、崔群、韩愈之辈，多为后来文坛政界的翘楚人物。这与韩愈那“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韩《与崔群书》）的情况大不相同。大概因为宗元天资聪颖秀发，刘禹锡《柳君集纪》曰：“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而且是名门之后，父亲柳镇又曾被皇帝亲口赞誉，所以年轻时代的柳宗元不像韩愈那样坎坷，而是一帆风顺，二十一岁就进士及第，因父丧守制三年之后，又于二十六岁赴吏部博学宏词科试中式而释褐登仕，入朝为官。当时许多大人物都想把他罗之门下，更多的人以和他结交为荣。宗元可称是风云际会，准备为实现理想而大展宏图。在长安交游中，他与刘禹锡韩愈

等青年进士出身的精英时常聚会，切磋道艺，谈诗论文，意气风发，好不快哉！这些自由争论和畅所欲言使他学问日进，视野渐宽，同时又锐气陡升，傲气时见。这个众人眼中的有为青年，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世俗嫉妒的目标。你不与俗人同流合污，当然就是世俗眼中的敌人。一旦他参加永贞改革失败，立即就成了世俗排陷打击的重点。为家族名誉考虑，也有性格原因，柳宗元不愿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但时局形势的重压及生活的煎熬又迫使他泪和着血往肚里咽。他的性格深沉内向，长贬不起、一蹶不振给他造成的压抑悲痛可想而知。政治上既没有出路，他只能把自己的才华和理想释放在文学中，永州时期创作了大量优秀诗辞文章，“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以艺术来形象地续展其积极人生。他与韩愈因生活道路及出身差异而思想品性有所不同，但发愤著书以文明道的精神则一致，文学创作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待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改革”的问题上，韩柳二人态度有异，立场判别。世人常因此在他们的思想间划上一道分界线，以为韩柳性质迥异。柳积极参加了这场兴利除弊的斗争，成了改革运动的中坚，失败后被贬遥远的南方。在长期的痛苦挣扎中，他虽也有向在京亲友求告的书信，但绝无低三下四、卖友为荣的混帐话。他很讲究原则，具有高尚峻洁的政治品格，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但因柳之高尚而把韩愈的思想品格一笔骂倒，恐怕失之草率而不合实际。如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对韩严加谴责，其激烈批判也有欠公允。的确，韩诗《永贞行》矛头直接指向了永贞改革及其领袖人物王叔文，诗云：“君不见，太皇（按：指顺宗）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嗣皇（按：指宪宗）卓荦信英主，……共流幽州魑死羽。”其态度与立场与柳迥异，我们应看到这一事实，并予以批判。但当时社会原因复杂，反对永贞改革的并不一定就该遭谴责。如史上公认较为正直的杜黄裳、武元衡等都明显反对永贞改革，为什么？我以为其中不一定有政治原则的根本分歧，比如永贞改革的重要措施是抑制强藩与骄横的宦官，而主张平叛与不假宦官以颜色，又是杜、武之类正直士人的严正主张，武元衡甚至为平

淮西付出了生命代价。强调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中央集权,永贞改革集团与杜武之辈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韩诗《永贞行》《赠江陵三学士》等均作于永贞改革失败之后的一、二年间。实际上,贞元十九年韩愈就被贬阳山(今属广东),永贞改革及后来顽固派发动政变的期间,他并不在京师,既没有参加改革运动,也没有任何实际否定或反对改革的言行。后来改革失败,宪宗上台,盛怒之下诏令柳刘等永贞八司马虽遇赦不得量移。此时,韩愈量移江陵,希望早日调还京师,所以写诗向皇帝表忠心,诋毁永贞改革,纯属“打死老虎”,在政治斗争中并无实际作用,却有损其人格。事实上在韩愈眼中,八司马与王叔文有别。对于刘柳的误会消除之后,他仍然给予真挚的同情,故《永贞行》云:“吾尝同僚情可胜。”又柳宗元《祭穆质给事文》云:“时忝宪司,窃分枉直。抗词犯长,有志无力。惟韩洎刘,同愤霭臆。”韩即韩愈,刘乃刘禹锡。两人志同道合,出自宗元晚年的回忆记述,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在永贞元年秋,韩刘在岳阳楼会见,彼此误会已经消除。韩很同情刘的遭遇,劝他给朝廷老臣淮南节度使杜佑求助,事见刘《上杜司徒书》,文中有“会友人江陵法曹掾韩愈以不幸相悲”等语。对于永贞改革的中坚人物,除个别人外,韩大多持关怀同情的态度,并没有一概打击。所以他和柳宗元的友谊贯彻始终而生死不渝。韩愈实际是赞颂永贞改革的进步措施的,比如反对强藩割据,主张维护国家统一;批判宦官集团骄横,维护朝廷权威;抨击贪墨之吏,主张任用贤人;同情人民的苦难,为受灾百姓请命,要求减免赋税……。在这些主要的政治思想方面,韩愈的论调和永贞改革的中坚人物刘柳诸人何其相似!后来,韩愈于元和九年编写《顺宗实录》时,基本忠于历史,较为完整地记载并保存了永贞改革推行诸项进步措施的史料,所谓“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而“人情大悦”,表面是歌颂顺宗,骨子里却赞扬了王叔文集团,感情溢于言外。因此,透过韩与刘柳对待永贞改革态度之异,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加以考察,又应看到韩与刘柳政治思想另有本质相通的一面。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韩柳能够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样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纲领。如果韩柳之“道”性质一反动一进步,韩

柳二人又将如何携手共进呢？而且在对待永贞改革的问题上，韩之思想也非反动。大多数的反对派——如杜黄裳、武元衡辈是出于宗派主义矛盾或士大夫的偏见，甚至可能掺杂了某些个人恩怨的成分，瞧不起王伾、王叔文以卑微出身而暴起领事。这样的认识虽有局限，却不是在政治思想上与王叔文集团有根本冲突。

另外，在政治上韩愈竭力维护“君权”（参见其《原道》），柳宗元强调“民生”（参其《送薛存义之任序》），一个眼光向上，一个俯首向下，其表现似乎迥异。但深入考察，则可发现另有奥妙。二人同样屡遭贬谪，柳长贬不起，韩却屡蹶屡起，因此韩在朝而柳在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重点自然不同。在宦官骄横、藩镇割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韩愈站在国家朝廷的立场，强调君权即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就意味着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反对分裂，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而且，如果不被成见蒙蔽眼睛，细细咀嚼《韩昌黎集》，自会发现韩愈并不因为主张维护君权就去否定“生人之意”，这只要读其《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自可明白：“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朝廷）岂有知而不救？”为民请命，要求减免租税以活黎元，为此而触忤贵幸，远贬千万里外的阳山。其《归彭城》诗又云：“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诃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剖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同情人民疾苦，不辞剖肝沥血。和柳宗元一样，韩愈不是也有关注“生人之意”的一面吗？晚年在袁州刺史任上，他曾向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学习，努力兴利除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做好事，采取了抑制豪强、释放奴隶等进步措施。

至于柳宗元，则因在野而远离京师朝廷，疏离政权中心，对于国家大事虽很关心，所视却不如韩愈真切。但若问对于民间疾苦的了解，显然在野者更有优势。他经常不是以恩赐者的“牧人”身份，而是平等地站在农夫野老的中间，娓娓而谈，交换意见，因此，在平等意识及民主精

神方面，柳高于韩甚多。柳高倡“生人之意”关心民生疾苦，并且为此作出了种种政治设想。只要读其《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之任序》《与元饶州论政理书》等，就会被他的民主性精神感动。这一思想的确难能可贵。但是，近人或把柳宗元的“生人之意”与近现代的民主意识相提并论，恐怕也是超越时代的不实之辞。因为柳宗元的终极目的与韩愈相同，仍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服务于当时的国家“中兴”。其《献平淮夷雅表》歌颂唐宪宗的“中兴”大功为“其道彰大”，又云：“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断，克清大憝，金鼓一动，万方毕臣。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校千古，无所与让。……（臣）思报国恩，独惟文章。”这与韩愈《平淮西碑》的基本精神如出一辙。又如《捕蛇者说》这篇名文，作者虽然很同情人民的苦难，但还是对捕毒蛇抵赋的蒋氏说：“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你看，上交朝廷的赋税是不能免的，其《梓人传》中有“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认为封建士人统治人民天经地义。他甚至说：“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方面，柳之目标与韩愈并无二致，所以其《守道论》明确宣示：“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其“大中”之道最终仍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

还有，在追求理想、坚持真理方面，韩柳二人异曲同工。柳因在野，政治上缺乏实行机会，大多表现为理论的剖析和思想的奋斗。永贞改革虽然失败，其精神不灭。他在《惩咎赋》中说：“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顾。”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他在《答周君巢书》中一方面描绘了自己“万受摈弃”的险恶处境，一方面又表示了“不更乎其内”的态度，决不向反对势力妥协，体现出高尚正直的思想品格。至于韩愈，则多在朝直接参与了朝廷的诸多重大事件，其理想抱负或有实行的机会。比如元和九年、十年，在平淮西叛镇吴元济的斗争中，他力排众议，主张平叛，与裴度同心协力。而且此前他还作有《论淮西事宜状》，为淮西平叛、统一国家的战争，从政略、战略到军事布防、后勤安排都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他力谏宪宗痛下决断，云：“况（淮西）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所论极其痛快淋漓，却因此忤触贵幸而由中书舍人左迁为右庶子。又如元和十四年作《论佛骨表》，以为“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批佛老却撇开佛骨，专在政体政论上作文章以探寻其祸国殃民之利害，语气激烈而情极恳切，为此触怒宪宗，差点被处极刑，幸赖宰相及群臣相救，才免死而远贬潮州，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河北成德军叛，朝廷征讨失利，举动失措。这时，晚年韩愈以兵部侍郎身份亲赴镇州叛军，为了国家民族，不顾个人安危，义正词严，消弭了一场祸乱，不失英雄本色。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苏轼称赞他是“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其思想品格的确有令人敬佩的一面。总之，同样的高风亮节是韩柳文学相辅相成、携手共进的思想基础。

二、学风之异同

在学术上，韩柳之异同很难一言以蔽之，应予以具体剖析。从异的方面来看，一般的思想史、哲学史多针对韩愈的道统说及性三品说，认为他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论；柳宗元则大力宣传了唯物主义无神论，具有思想理论的战斗品格（详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大致而论，所言有其根据，但断语失之简单。比如韩柳有关“天”的论争，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曾说作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把“天”当作有主观思想意志的上帝。柳宗元《天说》一文曾大段称引韩愈有关“天”的议论文字（按：今本韩集此文已佚，应予补辑）。韩认为人在受到社会压迫而痛苦挣扎的生活中，常是呼天抢地，骂“天”是“残民者昌，佑民者殃”，这是犯了“举不能知天”的错误。因为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又不顾及子孙后代地大量“垦原田，伐山林”，与“天”为仇，“坏元气阴阳也滋甚”。人类破坏了自然环境，当然受到“天”的惩罚，有什么可叫冤的呢？柳宗元对韩愈“天”说不以为然，在其《天说》中作了批评。他针锋相对，提出天、人相分之说，认为天地阴阳元气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存在，而不可能具有人的意

识。天地万物遵循其客观发展规律而运动不息，乃“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怎么会有意志有目的地去实行其“赏功而罚祸”呢？他明确地反对了“天人感应”的儒家“天命观”。很明显，在这场有关人和自然关系的“天”说论争中，柳宗元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对此作出了较为先进的理论阐释。比较而言，韩愈“天”说难免染有“天人感应”的主观唯心色彩，并未曾对“天”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探索，因此其思想理论落后于柳甚远。柳之唯物思想与先进的“天”说当然值得赞扬，但韩之“天说”是否因其唯心倾向就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比如韩愈对于人们滥伐山林等无限制掠夺自然、破坏环境所提出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不是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吗？在这方面，柳宗元未曾提到，韩之思想的超前性又于此可见一斑。

在对待佛老的问题上，韩柳的思想论争则是另一番面貌，犹如辩论赛，有正方，有反方。一般说来，韩在朝，从维护当前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反对佛老与民争利、与国争民，坚决批判中唐时代佛老所占据的政治经济特权，要求佛老还钱于国，还民于朝，其态度之激烈，可于《原道》见其一斑，“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行政措施虽未施行，但口号喊得连天响。韩愈是从“正面”立论。柳宗元则贬官在野，为了排遣内心的孤寂苦闷而醉心佛学。其部分文章如所作释教碑铭《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之类，宣扬儒、道与释三教调和的思想。《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云：“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本于其道的思想本质，柳氏称颂禅宗六祖慧能是“师以仁传，公以仁理”、“天子休命，嘉公德美”、“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教所被”。这是从辩论的“反方”来答辩。如果说韩批佛老是击其“实”——即针对中唐时代僧侣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而发，柳宗元则是从“虚”的方面——即佛老思想的宗教哲学方面来作维护佛老的答辩。中唐时佛老的特权确实损害了国家权利，表面看，韩愈主动挑起论战是气盛言宜，真理在握，且正中要害。柳宗元则因在野之故，置佛老特权于一边，不予理论，政治勇气的确输韩一步。但是，韩柳论辩双方并不因此定下胜负。实质

上韩之言颇为肤浅,仅论其粗迹而已,对佛老思想的哲学内容缺乏真正深入的认识:柳则深入探索了佛老哲学的思想本质,揭示了“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对中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统治思想之理论本质有明确认识,比韩愈要深刻得多。有关韩柳之思想论争,详参拙著《论韩愈柳宗元的思想论争及其实质》一文。

论争并非思想上势同水火,而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求同存异。韩柳的思想学术之作风也颇多相似相同之处。首先,韩柳在主观上都想尽量结合现实需要来作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论。如韩之《原道》《原毁》《师说》诸篇及柳之《封建论》《贞符》《天对》等文,或论国体制,或议思想哲学,无不立脚现实,为兴利除弊、安邦治国作思想动员和理论总结,绝非泛泛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摆脱了儒家传统章句之学,不拘泥一字一句的琐屑讲解,深入探究儒经思想实质,揭示其理论大义。在这方面,韩柳所走的都是唐代新经学的道路,成为由汉儒传统经学向宋代儒家新理学发展的思想过渡。着眼于现实的重大课题,是韩柳共通的学术兴趣,也是二人共同努力探索唐代新儒学的理论个性或思想特点。有关这一方面,诸多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述之已详,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韩《与孟尚书书》云:“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寤以微灭。”对于汉儒马(融)郑(玄)章句之学甚为不满。所以,当有人告诉他宜以古圣贤人之书为师时,他回答说:“师其意,不师其辞。”韩论六经,岂是章句之师所能牢笼?而柳宗元在京师之时曾拜陆质为师,学习啖助、赵匡的《春秋》新经学,重在为现实改革作理论准备,对于汉儒以来的传统章句之学,直斥之为“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年轻时尚且如此,更遑论永州以后时期的态度了。所以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公然指出:“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批判传统章句经学的目的在于注重现实问题,企望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这就是韩柳二人所要揭示的儒

家经典大义实质之所在。如韩愈《上宰相书》其三云：“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为了实现其忧国忧民、解民倒悬的政治理想，隐遁山林以清高自鸣尚且不可，更何况是贪赃枉法留下万世骂名呢？现实的国计民生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其《进士策问》十三篇以为圣贤立论“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弊而已矣。”又云“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仁义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同于《管子》，却与先儒重义轻利之言有异。为了实现中唐反对割据以统一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儒家道统文统自居的韩愈却敢于突破儒家思想局限，勇气自不同凡响。至于柳宗元，其称“大中”之道为“辅时及物”，也即理论要结合现实来加以研讨，思想理论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前提。为了实行现实改革，其《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之任序》突破了传统思想局限，重点讨论官与民的关系，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这振聋发聩的伟论启发了后代官吏是人民“公仆”的思想，其理论勇气与胆识更是前无古人。柳氏之言并非徒发空论，其《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就具体地回答了当时饶州刺史元夔（读音同序）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具体讨论了赋税制度的改革。赋税制度，不仅关系到国库虚实和国家经济实力，而且进一步关系到全国百姓千家万户的生活。柳氏在回信中一方面揭露了当时“贿赂行而征赋乱”的黑暗社会现实，无情鞭挞了横行不法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提出了“定经界，核名实”，也即以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核实田产与严格法制为基础的平均赋税的理论主张，希望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广大农民的负担。

其次，韩柳所称的“道”以儒为主，又贯通诸子百家，广泛汲取一切有益的前人思想之营养，来壮大自己的理论机体。因此，其学术视野非常开阔，其造就的学术之塔的基础深厚扎实。比如韩愈，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自称，“凡自唐虞已来，简编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于是“遂得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而奋发乎文章。”在《答侯继书》中也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

得而不观者。”可见他的学习与著作早已突破了儒家固守的传统领域，思想较为解放，绝不拘泥于儒经的一字一句，而是在学海中自由驰骋。他在《原道》中曾痛诋佛老为“夷狄之法”，恨不得“火其书、庐其居”；其《与孟尚书书》又称“杨墨行而正道废”，“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其实，韩愈的真实认识不一定如其公开的宣言，《读墨子》即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他因此断言：“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之于墨，称誉非止一端，其《争臣论》又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又如先儒痛诋管（仲）商（鞅）之类的法家思想，但韩作《进士策问》，大反儒家传统而自行其是，公然称颂齐行管仲之法，“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称霸；“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为统一中国而作努力，是管、商的历史大功。与韩愈相比，柳宗元的学术来源更“杂”。他公开宣称圣贤之言关键在于“行之如何”，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桐叶封弟辩》），不能被经典蒙住眼睛。有如此开阔的认识境界，显然是广泛开拓思想来源的缘故。其《与杨京兆凭书》称：“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与李翰林建书》云：“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所以他写文章，就常“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庄老同样是“取道之原”，并无歧视贬损之意。与韩力排佛老不同，柳之论说则通于佛释。“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是其要旨，这大概和他所说的“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生活道路有关。其学术取径更广于韩，因而其理论造诣更加深广。

第三，韩柳学术同具独立特行的创新意识，因而能放言高论、迥出流俗而启人至多。如韩愈《伯夷颂》云：“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举乎泰山不足为高，巍